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史家谈

大历史叙述背后的文明互动

□ 刘新成

全球史中译本的出版近来形成出版界的一道独特景观，除坊间熟知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新译第七版外，新问世的还有《世界：一部历史》《全球文明史》《新全球史》《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大地与人：全球史》《人类共同体史》《世界史》等。然而，把这些中译本都加起来计算，同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出版的宏观世界史著作相比，也只占很小比例。按说，西方流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历史学甚至还曾因之“碎片化”，那为什么这些宏观史作还能大行其道？

人类历史漫远悠长，而目下正进入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自会产生“如何理解世界变迁”“当下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人类应该怎样应对”之类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不管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历史学显得多么“无用”，恐怕还要首先回顾历史。所以，探讨“人类常规”、追究“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式和原因”、“认识、描述、理解世界范围的变化”，构成上述“大历史”论著的共同宗旨。

不但时代要求大历史叙述，学术传承也呼唤重塑“命运共同体”。如果说把本族、本区域的历史与异族、异地历史并为一体、互为参照是宏观世界史之基本性质的话，那么应该说欧洲向来有撰述“世界史”的传统。这可能与欧洲史上大一统局面较少，习俗不同、语言各异的各族群体长期杂处有关，也可能与“基督教世界”观念曾深入人心有关。不管怎样，欧洲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到近代的伏尔泰，现代的汤因比，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可谓代不乏人。而康德更有言称：“如果不用编纂世界历史的方式认识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只能走向绝望。”只是19世纪末叶以后，伴随欧洲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民族国家史学被尊为“正统”，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史几为“世界观”的同义词，属于哲学范畴，世界史才淡出史学领域。因此，当上个世纪中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倡导宏观史学时，他用的词是“回归”，而不是“开创”。

“回归”并不等于“复旧”。“回归”后的宏观史学较之以往，判然有别。

反对“欧洲中心论”。各族在撰写历史时，较之旁族，难免以本族为中心，这不足为怪。问题在于，19世纪以来，欧洲人把欧洲中心“提升”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欧洲是世界的典范、人类的楷模。按康德或黑格尔的解释，人类的宿命在于其理性潜能的充分挖掘，而世界历史则是人类将不同发展阶段的理性潜能作用于物质世界的进步过程。他们认为，到19世纪，欧洲人的理性已经发展到极致，因之欧洲社会已经兑现人类文明理想，进步过程就此结束，余下的任务只是把欧洲文明向世界各地传播。这样，书写人类历史当然应以欧洲为中心，因为其他民族或因社会停滞根本没有进步意义上的历史，或仅在欧洲人后面学步。

进入20世纪以后，两次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大战，彻底击碎了“欧洲理性至尊”的神话。而伴随后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既往理论受到空前质疑：理论自身失去客观本质，其意义或价值完全依附于认识主体（读者）的建构，所谓“公认真理”被视为权力的表征。这样西方长期以来自我标榜的种种“理性优势”和“文化特质”就失去支撑，被还原为西方政治、经济霸权的语言符号。西方的典范和榜样意义既被颠覆——如亨廷顿所言：“西方仅是特例，而非常例”——其“历史中心”地位自然动摇。宏观史学的“回归”及其倡导的全球视野，本身就是对西方中心的否定，全球史学家对西方中心论的纠正则采取“平等对待各种文明”“揭示文明的混成性质，淡化单一文明的纯粹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显非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去中心论”等多种形式。

转换视角。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15—16世纪西欧出现的民族国家是个体意志与普遍精神的统一，是绝对精神最高体现的特征之一，嗣后人类文明进程都只能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因此19世纪末叶历史学科一建立，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专业”史学家就以民族国家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兰克编纂的多卷本《世界史》也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叙述单位。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至今余风犹存。

而全球史学家认为，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中，无论是气候、地形、资源、天灾等自然现象，还是商业往来、物种交流、瘟疫传播、宗教传布等人为现象，都具有跨国别、超民族的性质，如果仅从民族国家角度考察，忽略这些有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跨国现象，势必造成对人类历史的误读。全球史学家反对“国家本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忽略世界各地之间的差异，也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分区叙述人类故事的方法，只是他们认为应该用更能体现世界发展动因的单位来取代民族国家。目前大多数全球史学家选择的单位是“文明”（或“文化共同体”）。他们所说的文明并不是19世纪欧洲文明史观意义上标识“进步”的文明，而是年鉴学派所定义的文明，即“长时段的、历经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动而持续下来的，处于人类社会结构最深层的文化共同体”。在全球史学家看来，民族国家是随政治而变动的区划，文明则是超稳定体系，民族国家只代表某个部分，文明则体现整体，而世界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所言，描述的是“整体的整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史学家在处理世界的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关系方面，与以往的世界史作者有一个显著区别，即他们不满足于而且更非侧重于罗列各种文明的特点及命运，而是更深入一步，揭示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并把这种文明之间的互动视为全球发展的动力之一。全球史学家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总会与其他群体发生联系，而在接触过程中，或出于学习的愿望，或迫于竞争的压力，或主动，或被动，自身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叫“互动”。这种互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全球性变化乃是这无数互动性变化的累积，所谓世界性重大事件不过是这种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而已。

多少个世纪以来，史家书写文明史时，总是习惯于把世界视为分裂的世界，集中描写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区隔、争夺和倾轧，却忽略了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社会本质是相互依存的，忽略了各种组织形式的人类群体都在互动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忽略了在5000年文明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共存、共生、共荣的生存经验，这是非常遗憾和悲哀的。而全球史学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说明各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这无疑对人类建立“命运共同体”具有启发意义。

环境变迁受到高度重视。环境史兴起于上个世纪晚期，发展迅速，当下几成显学。这当然与当前环境危机令人不禁怀想早期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关，也与西方，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研究比较重视地理因素有关。但是，全球史学家在环境问题上与传统的“地理因素决定论”迥然不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理因素决定论单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全球史学家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双向互动，即他们不仅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描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指出两者之间的制约关系。第二，许多全球史学家所说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即把社会关系也纳入“客观”范畴，并指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变迁之间存有密切关联度。

总之，全球史观提出思考人类历史的新视角，具有启发性，也引起争论。我国学者对全球史观的看法，赞同与质疑者兼而有之。但不管取何种态度，他们都呼吁我国加强宏观世界史研究，述说“中华民族的世界记忆”。

有所思

有对人类关怀才有创新高度

□ 丘成桐

改善高校引才机制是创新的动力

很多中国学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拿到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世界级的大奖，多数官员也认为这是对学者的最大回馈。但是一个学者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得到大奖，得到人家的重视。人类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在不断地与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交流中，了解我们人类生存的原因，生存的愿望。这些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在一般讨论的时候，都很少接触到和意识到，这是一个文化水准的问题。

美国花了不少时间，接受全世界各地的人才，不论其何种背景。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一直到最高的管理人才，美国用最好的条件吸收他们进来，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官，而是使他们达到最崇高的志愿。在哈佛大学，崇高的愿望很重要，但是大家也很了解金钱的重要性，所以哈佛大学花了很大的工夫赚钱，赚了钱用来做很基础的研究。

另外，在学校里面，从大学生、研究生到教授，都要有一定的愿望来了解别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重要理想和重要贡献，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科学的发现或者道德价值的讨论。

鉴于此，中国要充分考虑引进世界人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南亚的留学生，可是从欧美来的留学生还是较少，我们需要建设促进人才来华的机制。这么多年来，我在清华大学帮忙，发觉中国高校的资助完全跟世界名校脱节，我们没有促成环境，让美国的学生和教授长期在中国留下来。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医疗制度，中国的医疗体系对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学者本人和他的家庭，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学校也有很多奇怪的制度，比如体检，不通过体检就不能做留校教授。所以如果种种奇怪的制度不能改变，就不能引进更多的人才。

教育系统需要法律约束与观念更新

中国现在在教育系统和商业系统中，抄袭的风气都比较严重。现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抄袭的事件，例如把一篇文章里主要内容、想法吸收过来，放在自己的文章里，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抄袭行为，但在中国这种行为却不被认为是抄袭。

中国需要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太过注重考试，全国人民为了考试分数而困扰，一辈子以考多少分为荣誉，我很多同学还记得他当年中学时候考多少分，而不想自己以后做的项目成果是不是真的对社会有贡献。只有中国的学生才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考试思维伴随终生。教育部现在所谓杰出青年奖、自然科学奖、长江计划、千人计划等，所有的计划都基本上是某种程度的考试，拿奖要去考试，这非常奇怪。中国所有重要机制都要自己申请，自己考试。各个院士要自己准备所有的材料，所有获得荣誉的方法都是跟考试的做法差不多。

为了得到荣誉而用功念书或者做研究，这样做的研究，再高深也有限。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过五篇震动全世界的文章，我想没有一篇是为了得到荣誉而写的。假如学者是为了得到荣誉，为了得到学校的名誉，才去做学问的话，这个创新不可能有太大的创新，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提升，可是真的要做一个大手笔，是做不出来的。坦白说，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华人学者还没有产生过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大文章和大创造，至少是大部分还没有产生出来。

中国要开放中国学者的观念，不要因为荣誉或者考试，或者种种因素来奖励，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想法，要有一个崇高的思想，这是创新最根本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真正的创新才会随之而来。

政府对做学问的人是否充分重视也是个重要问题。我1979年来到中国，待了36年，感受到中国对学者是尊重的，但不是真正了解他的学问的尊重。只有改正这一点，才能够促使学者做出好的学问。（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中华春秋

司马迁的太史公传承

□ 张显传

司马氏是周太史之后

众所周知，《史记》位在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因职务上的方便，广泛接触古今典籍，继承他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能言六家要旨之短长，有志于对于历史论述的长处，官至太史令，最后写就了《史记》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起初，他把这一著作称之为《太史公书》，说明它确实是由“史，记事者”引发的，遂把这一著作称为《史记》。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只有史官才是编写历史的，所以，司马迁理所当然地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史官。

其实，记载过去事迹的书籍称作《历史》，记录过去事迹的人被称为史官，中国古代设置史官要早得多。有文献说“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有人统计约有三十九种六大类，是涉及各个部门的一项繁杂事务工作。比如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称作史官。总之，史官是中国古代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统一指挥，有序工作，在这些史官中，设“大史”一职，为“史官之长”。“大史”就是“太史”，所以“太史公”格外受到重视。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谈及自己的家世，以及当任史官的历史。他说自己家族从颛顼时就任主天之官。“天官”就是“史官”。“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继续天官的事业。只是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时，开始设“司马”一职，这时，黎氏就“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是夏官卿，专门掌管军政与军赋等兵部事宜，开始不掌国史，丧失了掌管“史”的权力。之后，司马氏的后人“去周适晋”，跟随国君在卫、赵、秦等国征战，多次荣立战功。至西汉时，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为汉市长”，他的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到了他的父亲司马谈时才恢复了太史公的职务。

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的泣语。此时，司马谈由于身为太史而未能参与汉初的封禅，心情激动，悲生愤怒，他对司马迁说及司马氏家族“世典周史”，嘱咐司马迁承继周太史事业，并要以孝扬名于世外，同时重点强调了“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那么，司马谈为什么要强调司马氏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而这个“周室之太史”又指的是谁呢？

史职一脉相承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中对此作了回答：司马氏是周代史佚的后代。司马谈说的周之太史就是指史佚。

原来，史佚最早叫尹佚，是周文王之子伯邑考的儿子。起先他一直负责典司天地和祭祀的工作，子孙后代也就继续守着这一官职。

西周建立前，周王向师氏和尹氏两位将军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率军东征，师氏与尹氏在征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尹佚作为周王重要的随从，不离王的周围，随军出征，并参与军事活动，为建立西周王朝，使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立有战功。征服商朝后，他在祭天大典上，历数纣王种种罪行，册告皇天上帝周人为什么要伐商，最后宣告周朝受天之命，来经管这个国家和民众。

尹佚为人严正，经历了周朝的文、武、成、康四朝。他“博闻强记”，能承“天子之遗忘者”，这在没有纸张记录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才能。因此，他成了周王的近臣。之后，周成王命尹佚与南宫一起掌管周朝的九鼎宝玉。在展示宝鼎典礼上，周成王立中听政，周公在前，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尹佚在后，形成四大臣共同辅政的“四辅”局面，场面非常壮观，人称为“四圣”。

尹佚任职期间尽职尽责，能为周成王提供咨询，帮助分析政情，做了不少好事。有一次，尹佚以桀纣亡和汤武兴为例，规劝成王节制民力、爱惜百姓，要言而有信。并认为善之则臣，不善则仇。作为君主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才能行政。这些发自肺腑的建言献策，自然会引起周成王的重视。

同样，司马迁传承了太史公的职能，凭借他年轻时有过多次远行的经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有机会接触民众、倾听民众的诉求，并结合自己的身世和感受，把这些成果转化在他著书立说的源泉中。

《史记》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标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倾注了司马迁的满腔热情。《平准书》中记述了汉兴七十多年来的繁荣与兴盛。他从社会经济繁盛发展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腐化和贪纵，看到了国家富庶中存在着的衰耗，这种盛中观衰的历史价值有其普世意义。《货殖列传》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它论证了财富与道德的关系，说明财富对于政治、道德有着重要的作用。《史记》中还特别把人心向背作为考察的重点，其中明确提出，秦时“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因此，“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找到了陈胜等这些平凡小人物发迹的原因，也从他们身上体验了对于人生、对于世事、对于历史的感悟。

从君子一言到一家之言

尹佚能尽到一个史官的职责，还能及时纠正与监督帝王的行为。《史记·晋世家》和《史氏受姓祖图总序》中都记载了一件与此相关的史事：

成王与弟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戏曰：“吾以此封若尧。”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乃封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这个天子无戏言的故事说明作为太史公的尹佚秉承史家传统，感于直言，办事有据、说话有理，在周成王分封叔虞为唐侯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君王的话非常重要，国君的话不是玩笑，言则成为历史，则必须兑现承诺。

尹佚因与周公、召公、太公“四圣”辅佐成王有功，按周朝规定应以功受封。于是，成王就封尹佚于洛阳，以原有的史官、太史的通称，尹佚就成了史官之首为太史公。与此同时，周成王又把“史”字专门赐姓给尹佚。自此开始，尹佚以官为姓，改称为史佚，史氏家族全体成员也就开始以官为姓，改称史氏。

时光在变，作为太史的史观追求与理想不变，之后，史佚的子子孙孙事业上继承祖业而成为太史，行动上史家秉笔直书的风格却一直没有改变。

应该指出，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太史公史识更是在西周时期史佚的太史公史职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的。

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直言为李陵辩解而触怒武帝，被捕入狱，遭遇侮辱。他以史家的特殊性格，学习“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精神，敢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著书立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在《史记》中常以“今上曰”“上以为能”“上所欲挤者”“上所欲释者”的口吻，直接对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和武帝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不屈不挠、不惧死，敢于冲破因循守旧的风格，正是史家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反映。

由此可以看到，史佚的“天子之言”说出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盼。之后，人们将其转化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定式，把君主行为变为对君子的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人们思想境界的高尚。到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许。司马迁通过史书加强对于行政的监督，要求他们成为治理与行政的明白人。诚然，这种督察的本质是爱护，其目的是希望社会与政治能清明起来。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君子一言”与“一家之言”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言九鼎体的表述承载了史家对于历史的承诺，承诺就要兑现。所以，司马迁是承继了太史公作风的，但是，他又大大发展了史家的作为，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史官理念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中华“和”文化—印—书法系列作品



和谐人生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